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目录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关于作者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致谢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封面说明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IV: 藏传佛教

迫害严重程度:

藏传佛教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藏传佛教



主要调查发现

- 1 复兴与发展:** 在“文革”的残暴破坏之后，藏传佛教有了显著复兴。在过去十年，它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汉族精英中赢得了数百万新信徒，这些人与大约600万藏族人一起加入了这个传播广泛的宗教信仰。
- 2 严密管控:** 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施行严格控制，尤其当其事关对流亡的达赖喇嘛的虔信——这是很多信徒的核心原则。官方人员派驻寺院、无处不在的监控、例行的“再教育”运动、对旅行和通讯的限制、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绝大多数寺院僧众和很多世俗信众都产生了影响。不过，针对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藏传佛教派别，管控措施的落实程度有所不同。
- 3 武力打压:** 在藏族地区，中国安全部队会快速采取强制措施镇压他们认定的宗教不同意见，包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真枪实弹。人权团体和媒体的报导显示，自2012年11月以来，至少有321名藏人因涉及宗教行动或意见表达而遭到拘禁，其中75人被判处徒刑。³ 每年都有若干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间丧生。⁴
- 4 在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续了胡锦涛时代的政策和打压运动，并且深化和扩大了某些管控措施。一些新的管控措施增强了政府与僧俗信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对协助自焚者判罪，取消过去允许的节日活动，加强对私人宗教活动的粗暴限制，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篡改藏传佛教教义和操纵宗教领袖的传承。
- 5 经济的胡萝卜和大棒:** 政府采取各种不同的奖惩措施，鼓励地方官员使用强制性而非合作性的方法来处理与藏传佛教界的纠纷。经济手段也逐渐地被用来作为一种集体处罚方式，用以吓阻抗议行动或对宗教打压的反抗。这种措施常常会影响整个家庭或村庄的生计。



2016年，在强拆前和强拆中的著名色达五明佛学院。据报中国当局试图降低来此学习的藏人和汉人的人数。

图片来源：维基媒体 / Jimmy Lee, Contact 杂志

6 韧性与抗争：尽管遭受了超过20年的镇压，事实证明藏人私下对达赖喇嘛的虔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中国官员和媒体对达赖喇嘛持续不断地斥责和污蔑，是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最令藏人反感的部分之一。强迫僧俗信众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的扩大，一直是挑起抗议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2009年以来的（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也有很多藏人采取较为细致的抗争方式，创造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受到禁止的宗教活动或分享信息。



“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

—张庆黎，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07年3月¹

“政府的宣传是没用的，人人都知道这些是假的。（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所有藏人的一切。在西藏，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见到尊者。”

—尼玛拉姆，最近来自四川的流亡难民，2016年8月²

藏传佛教在当今中国

若干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和它遍布各地的僧尼寺院网络，一直是藏区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个地区很多宗教场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自17世纪中期的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统治整个西藏高原以来，政治与宗教权威尤其密切相关。

藏传佛教独特的宗教传统——它的宗教经典、舞蹈、密宗修行以及作为寺院教育中心部分的辩经活动——都与在中国其他地区被广泛接受的大乘佛教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宗教活动通常包括在寺院中进行供养、念颂祈祷文、在家中设立佛堂、庆祝一年一度的各种节日、完成在拉萨和高原其他地区各处圣地的朝拜等等。⁵ 这些活动在中国的藏区相当普遍常见。不过，同样常见的是大批部署在一些主要寺院周围的重装武警和警察，以及安装在宗教场所内部和周边的监视摄像头。

过去10年，限制措施在绝大部分藏区都有所加强，但是执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众群中有所不同。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截至2014年在全国各地共有3600座有宗教活动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庙宇，有14.8万名藏传佛教僧尼，远远超出汉传佛教僧众的统计数字，显示出宗教制度在藏人中所占据的特殊重要地位。⁶ 据称，其中有1787个宗教场所和超过4.6万名僧尼位于西藏自治区境内。⁷ 尽管无法获得信众的确切数字，一般认为除非是担任中共党员或是政府官员，生活在中国的628万藏人绝大多数都会参与某种形式的藏传佛教活动。⁸

除了公共视野中民众的虔诚和政府的管控之外，还有一系列针对僧俗信众宗教活动的幕后限制措施，严厉的——有时是致命的——镇压行动通常由安全部队执行。过去10年，限制措施在绝大部分藏区都有所加强，但是执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众群中有所不同，而且也随不同的特殊时间点有所波动。有若干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

- **地理位置：**相比于其他省份的藏区，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明显更加恶劣，尽管这种差异近年来逐渐缩小。在四川、青海和甘肃的那些有主要寺院的地区管控似乎更加严厉，而在其他更加边远的地区以及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庆）则比较宽松。⁹ 因而，有些村庄一轮接一轮地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其中就包括了强制攻讦达赖喇嘛，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基本上可以幸免于此。¹⁰ 藏传佛教的那些来自中国的汉族追随者们通常实践的是一种混合版本的信仰，结合了一些来自汉传佛教传统的因素。他们的宗教实践或许不包括对达赖喇嘛的崇拜，这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比较少的官方制约。
- **地方官员的态度：**尽管有来自中共中央的强硬政策，地方官员在管制他们自己的辖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少数藏族自治州，某些尤其本身是藏族的官员对宗教活动较为了解，并和当地寺院保持着一种更具合作性的关系。除非受到中央当局的压力或是被迫处理一些备受关注的抗议事件，他们较少采用敌对性的措施，对一些违反政策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¹¹ 甚至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党委书记领导下，打压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¹²
- **不同的藏传佛教派别：**达赖喇嘛领导藏传佛教最大的派别格鲁派，不过信奉其他派别的藏人同样尊崇达赖喇嘛。很多宗教限制措施同样施加在属于宁玛派和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和信众身上。尽管如此，尤其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上，那些来自非格鲁派的高僧们似乎较易抵挡一些官方的限制性措施。同时，雄天（Shugden，藏传佛教中的一位神灵）信仰者与达赖喇嘛有着历史恩怨。近年来，中国当局试图利用他们之间的内部分歧，给雄天派寺院和宗教领袖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甚至鼓励格鲁派寺院的僧人崇拜雄天。¹³
- **寺院规模：**寺院规模大小悬殊，小到只能容纳10到20名僧尼，大到如同一座城市，有数千

人居住其中。大型寺院更易于吸引政府注意力和产生政治异议，进而导致受到安全部门的镇压和干预性管控。

- **敏感日期和事件：**安全部队的部署、通讯管制的实施以及对大型集会的限制，事实上都未必是永久性的。相反地，当局经常是在一些政治敏感日期之前采取这些措施——比如3月份的西藏起义周年纪念日或是7月份的达赖喇嘛生日等等——或者是为了响应某些事件，比如自焚或是在某个集市上发生的小型抗议。

由于当局扩大了干预性限制措施、“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以及加强对西藏自治区以外更多地区和较小寺院的监控，上述在管控措施方面的种种差异，近年来已经逐渐消失。

藏人中的藏传佛教信徒人数大体保持稳定，而在过去十年有关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追随者，尤其是一些城市精英。据信有数百万人皈依了藏传佛教。¹⁴一些观察人士把藏传佛教，而非汉传佛教，在汉族人当中越来越受欢迎归因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能够直接地为信众们提供更加广泛的精神引领，以及很多汉族信徒对获得超自然能力的兴趣。¹⁵

这种变化对藏区的宗教活动兼有正负两面的影响。一方面，拥有大量汉族信徒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庙宇有更好的管道获得捐赠和来自非政府管道的资金，以及在北京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汉族支持者或许能够在危机时刻进行某种干预，缓和镇压行动并且促使地方官员和寺院领袖通过协商解决冲突。¹⁶

另一方面，汉族信徒的增加也许会引发新的政府干涉。例如，中国政府在2016年1月发布的政府认可的转世活佛数据库，一些专家解读，因为这样的宣告对于藏人信徒几乎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当局此举主要是力图诱导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的汉族信徒。¹⁷一位学者也把自2016年夏天开始的喇荣佛学院的一系列强拆行动，归因于政府担心其在汉族信徒中的影响力，据报导，有至少1万名学员在那里完成了学习，这个佛学院的一位资深宗教领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累计有超过200万追随者。¹⁸

中共政策的起起伏伏

在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藏区，并且轻松击败了藏军。第二年，这个地区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并。最初，中共领导的政府试图与西藏政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建立起一种合作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很快土崩瓦解。¹⁹1959年，中国军队镇压了在拉萨发生的大规模起义，据称有上万人被屠杀。达赖喇嘛被迫带领大约10万名支持者逃亡印度。²⁰

1965年，大部分西藏领土被纳入西藏自治区，而西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则被作为藏族自治州并入相邻的各个中国省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西藏地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或摧毁。成千上万的僧尼被迫脱下袈裟还俗，任何表达宗教信仰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禁止和严厉惩罚。²¹

汉族信徒的增加也许会引发新的政府干涉。

在1980年开始的改革时期，政府重新允许有限度的宗教活动，寺院的重建也逐步开始。恢复的规模和步伐很快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的警觉，并在1980年代后期试图对寺院施加一些干预性管控措施。在1987至1989年之间，这些管控和其他一些不满情绪引发了在拉萨和周边地区近200起大体上是和平的抗议示威。随着反政府抗议在1989年3月升级，政府在拉萨实行戒严，持续到1990年5月。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胡锦涛，后来在2003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0年代的政策特点是，中共稳步提高了对藏传佛教的管控措施并努力削弱流亡的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将达赖喇嘛认定为敌人，这是一个关

键性的转变。中国国家媒体随即开展对达赖喇嘛的中伤诋毁，对拥有达赖喇嘛画像和崇拜达赖喇嘛的禁令也很快见诸报导，不过当时这些禁令的法律基础依然不明确，执行程度也因人而异。²² 在随后几年，中共统战部在各个寺院开展了各种“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强制性的“学习班”例行地要求僧尼对达赖喇嘛进行口头和书面的声讨。²³

到200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内的各种限制措施已经相当严格，而周边省份仍然相对宽松，藏人依然可以在各省区之间旅行以及获准出国。仅在2007年，就有数千藏人利用各种机会去拉萨甚至去印度旅行，进行朝拜或聆听讲经说法。²⁴ 从2005年左右开始，中国当局开始扩大“爱国主义再教育”和其他强悍的措施，以期降低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影响力。

学者们认为，这些管控措施的扩张是导致2008年3月10日拉萨动荡的关键因素，当时来自拉萨哲蚌寺的僧人领导了一场1959年起义周年纪念游行。²⁵ 在安全机关镇压了僧人们的抗议之后，骚乱爆发了。一些藏人袭击汉族居民并焚烧了汉族和回族人拥有的商铺以及政府办公场所。很快地，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人聚居地区爆发了超过150起大体上是和平的抗议活动。

政府最初的犹豫，明显是为了避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仅仅几个月时间引发一场引起世人关注的冲突，但最终决定部署大量武装部队作为响应。在至少四起事件中，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枪。²⁶ 中国有关当局报导说在拉萨有19人丧生，主要是死于火灾。²⁷ 而海外藏人团体则声称有至少100名藏人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示威的过程中，遭到杀害。²⁸ 在最初的镇压行动之后，各个寺院被安全部队重兵严控长达数月，同时有数百名涉嫌参与抗议或向海外提供消息的僧俗藏人遭到逮捕和监禁。²⁹

据说，很多官员对西藏高原各地发生的众多大规模藏人抗议事件感到震惊，因为很多人觉得过去9年里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意味着藏人已经接受了中国的统治并且降低了对达赖喇嘛的虔信。³⁰ 事件后中共领导人重新检视了他们的对藏政策，但其非但没有放松那些引发不满情绪的限制政策，反而是强化它们。很多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僧人和学者一再指出，2008年是政府管理藏传佛教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至今，藏区遭遇了更严格的旅行限制、更密集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及在宗教庆典活动和寺院周围部署更为强化的安全力量。³¹

习近平治下的藏传佛教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掌中共之后，他继承的是一个形势殊为紧张的西藏高原。一系列自2009年开始的自焚抗议事件在那时达到顶峰。³² 据报导，由于西藏的文化空间长期遭受侵蚀，以及藏人2008年后在宗教信仰、旅行、儿童教育和日常生活受到的日益严厉的限制，他们深感愤恨和无助，这些经历和感受因而促使他们采取如此决绝的抗议行动。³³ 仅在2012年11月，人权组织报导了28起自焚事件，表明有些藏人至少希望吸引习近平的关注，并希望他能采取较为怀柔的政策。³⁴

“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

— 习近平，2015

在2013年上半年，有那么一个短暂而罕有的政治机遇，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学者发表了数篇文章，呼吁在西藏地区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一位来自中央党校的专家建议不要再将达赖喇嘛看做敌人，甚至应该允许他作为“宗教领袖”访问香港。³⁵ 有观察人士认为，曾担任胡锦涛副手和统战部部长的令计划³⁶ 在推行对藏强硬政策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其在2015年1月被捕或许会为比较“怀柔”的对藏政策创造一些空间。³⁷

这种乐观态度估计迄今未见任何成效。习近平尚未恢复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上一次为人所知的会谈还是在2010年。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当局基本上延续了胡锦涛时代采用的手法，包括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更加明目张胆的大

规模严厉侵犯，有时甚至还导致了人员伤亡。

在2015年期间，中共的对藏政策似乎成为官方的优先议程，其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个地区的白皮书，³⁸ 8月中共召开了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国家媒体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报导显示，中国政府打算保持强硬姿态，同时加强教育运动。官方声明明确拒绝了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在中国之内实现真正自治的“中间道路”提议，并断言中共将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尤为重要的是，在7月份召开的一个高层战略论坛将焦点放在如何协调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省份藏区的“维稳”措施，这个能意味着将来对周边藏区也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³⁹

尽管政策在总体上是延续的，不过有关当局还是对若干现行限制措施的范围进行了深化和扩大。下面援引的各种措施——包括处理自焚案件的指导方针和篡改藏传佛教教义的计划——都是直接由中央当局推动发起的。在2015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宣称要“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则似乎是由其他较低阶的政府当局主动发起。

1. **以“连坐”阻止自焚：**自2012年底开始，一些地区的官员采用诸如取消自焚者家庭的公共福利或者停止自焚者村里的国家资助项目。⁴¹ 2012年12月份，中央的司法和公安机关公布了指导方针，要求将所有参与自焚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协助、聚众行为都视作刑事犯罪，在部分案例甚至可以被视作故意杀人。⁴² 2013年，政府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抓捕自焚者的亲友并判以长期徒刑。
2. **频频禁止节日庆典：**尽管有些宗教庆典过去就被禁止，比如达赖喇嘛的生日，但是自2012年以来地方当局限制了更大范围的庆典活动。2014年5月，政府对试图前往岗仁波切峰（Mount Kailash）的人下达了旅行禁令，这座山峰是藏传佛教一处重要的朝圣地。随后在6月份，（那曲地区）比如县的一项地方规定严厉禁止藏传佛教信徒前往参加一个大型法会（指2014年7月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拉达克地区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译者注），这是藏传佛教信徒们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之一。⁴³ 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像2015年6月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译者注）的赛马会，也因为间接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崇敬而被取消。⁴⁴ 即便有些节日活动得到许可，也经常伴随有大量武警部署，破坏宁静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摩擦也会迅速升级为致命冲突。⁴⁵
3. **加强处罚一般信徒的宗教活动：**虽说全国各地的中共党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但西藏地区包括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和教师，都被禁止或积极阻止参加那些其他人通常被允许的藏传佛教日常的宗教活动，包括去寺院进行供养和在家中私自设立佛堂等等。⁴⁶ 2015年期间，在一项明显是为了强化这些禁令的行动中，西藏自治区当局对中共干部和公务员当中的违纪行为进行了处罚。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所说，这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那些“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的人。⁴⁷ 另外，在2015年初，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干部们传阅了一份文件，其中列举了各种可能受到严惩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被解读为支持西藏独立；像念颂祷文和烧香这样普通的宗教活动也被名列其中。⁴⁸
4. **篡改教理教义：**一个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方案在习近平当政后变得来势汹汹，这项方案旨在篡改藏传佛教的教理教义，使之能更好的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⁴⁹ 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教授在他2016年出版的《党即是佛》（Buddha Party，暂译）一书中详述了这个方案。该方案在各项内容当中包括了，自2012年起举办藏学会议，以确定藏传佛教的教义中哪些是对党有利的，并且每年出版类似于《藏传佛教教义阐释》（2011年出版）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据称是各个寺院的指定阅

读，而且已经成为“爱国主义再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

一个同时出现的事态发展是，2011年10月在拉萨开办了一所新的政府支持的“西藏佛学院”，它的第一届毕业班已于2013年完成培训；该佛学院所属的“尼姑部”也正在建设中。⁵⁰一位学者认为官方的这些努力与2016年开始的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存在某种关联，此前若干年政府对喇荣五明佛学院一直比较宽容。⁵¹最近一些年，这个佛学院的各寺院领袖在推广一项伦理层面的“佛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运动已经赢得成千上万的藏人追随者，因而可能被当局看做是官方自身试图改变藏传佛教信仰内容的竞争对手。⁵²

有众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就算这些手段明显地增强了不满情绪，而且在遏制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方面收效甚微。

首先，中共对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内在的焦虑依然未变。正如学者本·希尔曼（Ben Hillma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注意到的，“有组织的藏传佛教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共产党在西藏地区统治的最大的潜在威胁。”⁵³

第二，这些政策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假设，即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相关的民族认同——将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消亡。中国领导人依然对他们以现有工具实现这个长期目标的能力，保有自信，即便过程中有偶尔的动荡挫折。⁵⁴

第三，领导人的个人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1年8月上任，直至2016年8月离任。自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实施若干项目，旨在对民众进行监控和在僧俗信众当中灌输中共的信条。对于西藏的这个地区而言，地区领导人的变动似乎要比一年后北京更全面的权力交接对政府的日常行为影响更大。

第四，虽然令计划遭到清算，但“统战部”依然是中共的一个实权部门，也是在藏区实行诸如“爱国主义再教育”这样的“管控与拉拢”策略的主要推手。统战部目前的上级主管是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他也是政治局下属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最后，有关官员提拔和对西藏地区的中央集权式的资金分配等结构性因素，也促使地方官员将精力集中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打压社会动荡，而不是去解决社会需要以及与宗教人士建立合作性的关系。同时，给地方政府输送的数十亿元“维稳”经费也刺激了安全机构的扩张，使安全部门有持续其打压行动的机构性利益。⁵⁵

主要政治管控手段

中国对西藏的僧俗信众实施了范围广泛的管控措施。这些措施日益侵入和蚕食到一些原本不受骚扰的生活领域。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监控措施——通过安全部队、线人、闭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监控，甚至包括无人飞机⁵⁶——已经给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动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和恐惧的氛围。在公共场所和寺院里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和口号，时时提醒僧俗民众官方的各种宗教管理规定，要求人们将对国家的忠诚放在首要位置，以及告知违反规定——比如携带念珠或其他宗教物品进入政府大楼或学校——将会遭受的惩罚。⁵⁷

所有这些措施，再加上以下列举的这些主要管控措施，似乎都是服务于中共旨在管理藏传佛教的一些目标：

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监控措施已经给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动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和恐惧的氛围。

- 削弱寺院与周围社区之间的联系
- 切断民众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宗教领袖们之间的纽带
- 提高政治上忠诚的宗教领袖和有利于政府的教义阐释的影响力，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政府指定的班禅喇嘛
- 在藏人当中培养宗教认同度较低的社会经济精英
- 限制寺院社群的规模和寺院教育的质量。
- 阻止因宗教信仰或对达赖喇嘛的虔信而引发的抗议

1. **管控宗教领导人，包括转世活佛：**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如中国佛教协会，不遗余力地掌控对宗教领袖的任命，并利用他们来向其信众传达政府立场。就藏传佛教而言，由于转世系统在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和高僧（如一些主要寺院的住持）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项任务尤为棘手——甚至有些荒诞。作为明确表示自己是无神论和拒绝相信灵魂转世的中共，坚持要把对自己的政治忠诚作为前提条件来管理转世灵童的选择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认可。

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了一份文件，名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声称活佛转世必须得到国家批准。⁵⁸ 2016年1月，有关当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官方认可的转世活佛（朱古）的网上数据库，引人注目的是达赖喇嘛被排除在这个数据库之外。近年来，那些试图对他们的未来转世提供指导或是征求达赖喇嘛意见的寺院领袖，或是遭到拘捕、驱逐，或是被禁止与他们寺院的僧人继续进行交流。⁵⁹

按照2015年8月发布的官方统计，有超过7千名官员在西藏自治区的1787座寺院里工作。

2. **对僧尼寺院实施大规模管控：**有一长串政府规章条例影响着寺院的生活，其中包括各个寺院许可的人数限额，有关在寺院内和周边社区举行宗教活动必须获得官方批准的规定，以及要求详细记录寺院财务状况和每月汇报“爱国主义再教育”的进展。⁶⁰

通过摄像头或是在寺院中实际部署警力进行的大规模监控，从而威逼僧人就范，同时也提供途径来识别政策落实中的漏洞。对拒绝服从者的处罚包括从逐出寺院、开除僧籍、逮捕入狱直至彻底关闭寺院。过去，官方工作小组进驻寺院，尽管有时会长达数月，但仍仅是临时性措施，并且，寺院日常的管理委员会还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僧尼领导。如今，在寺院永久性派驻政府官员的管控模式自2011年8月起逐步扩大，并通过201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而得以正规化。⁶¹ 按照2015年8月发布的官方统计，有超过7千名官员在西藏自治区的1787座寺院里工作，平均每座寺院四名。⁶²

3. **“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扩大化：**自1990年代起，就断断续续有意识形态教育运动，但是从2008年以后，此类运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漫长。而且已经逐渐超出寺院的范围而向藏区一般民众延伸，如强迫学生、公务员、农民和商人参加学习讨论、唱红歌、及看宣传电影。

从2011年开始，据报导有超过2.1万名干部被派往西藏自治区各地乡村。除了政治监控和其他任务，据称他们还要在宗教场所和信众当中举办“爱国主义再教育”学习班。⁶³ 这样的学习活动通常会要求谴责达赖喇嘛，承认政府选定的班禅喇嘛以及宣誓效忠于中共的政治权威。“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向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更多寺院和一般民众的扩张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而且据称在很多藏人中引起反感。

尽管达赖喇嘛准许藏区的信众们可以在遭受逼迫时对他进行谴责，因为这事关自我保护，但是很多忠诚的信徒依然对这种做法感到难受。⁶⁴ 那些屈从的人指出他们因此所遭受的心理摧残而最终中断他们在寺院的长期研习。⁶⁵

4. 在藏区内外限制旅行：在过去十年，藏人出国变得越来越难，无论是寻求庇护或是去印度或其他的国家的短暂访问。进入尼泊尔的难民人数从2007年的超过2000人锐减到2014年的大约100人。2015年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显示，藏人常常被拒发护照或是在从印度旅行返回之后受到讯问。⁶⁶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对这些限制措施的效果感到骄傲，他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声称，“在2015年，西藏自治区无一人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举办的法会。”⁶⁷

在藏区，僧尼出国旅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近期的游客还提到了一项自2012年起执行的非正式禁令，限制任何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访问这个地区，包括那些前往朝圣的人。⁶⁸ 学者们也注意到越来越严格的旅行限制，尤其是藏人再也无法逃出境外，更加剧了他们的绝望情绪，进而激发了自焚等极端行为的出现。⁶⁹

5. 加强信息控制：局部地区的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封锁——尤其在那些出现自焚事件的地區——时有发生，而且自2012年初以来愈加频繁，并持续到2016年。⁷⁰ 2016年，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5年479起藏人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押的案件，确认其中有71人是由于传播图片或信息而遭逮捕。⁷¹ 那些案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涉及传播与自焚相关的消息，被告人最高被判处13年刑期。⁷² 那些曾经与藏区同仁保持密切联系的流亡海外的僧人和活动人士报告说，到2016年初，从藏区获得信息已经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此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能停止与国内的人联系。⁷³

一位著名喇嘛在狱中去世，据报导安全部队开枪驱散了大约一千名集会悼念他的群众。

6. 动用武力镇压，伤亡时有发生：在藏区的安全部队经常使用武力手段来镇压和处罚那些他们认为的政治异议，这包括一些出自宗教信仰的非暴力行为。2012年以来，有很多藏人由于拥有或分享达赖喇嘛的图片、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或是制作和传播其他被查禁的有关宗教或宗教压迫的信息，遭到拘押或被判入狱。⁷⁴ 曾经遭受拘捕的人不断提供有关酷刑的记录，例如殴打、电击棒电击、被迫长时间保持一个难受的姿势等等。⁷⁵ 这些虐待，再加上得不到医疗照顾，据报每年都有若干西藏良心犯在拘押期间丧生，这其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⁷⁶

除了发生在警察局、违法设立的拘留中心和监狱的虐待事件，据了解安全部队会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有时甚至是在宗教庆典期间，而涉事军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在2015年7月一个著名的案件中，著名喇嘛旦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⁷⁷ 据报导安全部队开枪驱散了大约一千名集会悼念他的群众，至少有15人因枪伤被送往医院。⁷⁸

经济奖惩：胡萝卜、大棒和旅游开发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日益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汉人对藏传佛教日趋浓厚的兴趣，在过去十年，藏区国内外游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可预期地，西藏高原各地的官员都试图利用这个生财之道。由于西藏自治区增加了旅行限制，包括时常禁止游客进入，自治区周边各省的藏区获得了游客们的广泛青睐。

在云南省迪庆州，地方官员与藏传佛教领袖建立起实质的关系并且为修葺重要寺院提供资金。双方在迪庆州的主要城市被更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虚构的人间天堂——之后，都从旅游业的急速发展中获得了利益。据报导，这些经济收入使得寺院可以资助年轻的僧人去其他宗教机构深造。一般信众也从以旅游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了利益，旅游业提供了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不像政府工作人员那样受到各种宗教禁令的约束。根据学者本·希尔曼 (Ben Hillman) 的研究，这种富有成效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迪庆州采取了“中国藏区最为开放的方式对待藏传佛教”。⁷⁹

在其他一些藏传佛教地点，旅游业据称则对宗教自由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 响。例如，拉卜楞寺的僧人们就抱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造访干扰了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⁸⁰ 在西藏自治区，一位国外观察者则关注到，在一座寺院内部和周围原本住着一些藏人朝圣者的地方，现在已经由一些针对中国游客的停车场和纪念品商亭取而代之。⁸¹

中国当局还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促使藏人顺从政府各项指令和举报他们的同胞。政府提供最高20万元（3.1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提供与自焚事件或其他抗议行为僧人相关信息的举报人。“顽固不化”的寺院所获得的政府资助会转而流向那些政治上更加忠诚的寺院，或是世俗的社会服务提供商，抑或是新的基础建设项目。⁸²

政府提供最高20万元（3.1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提供与抗议行为僧人相关信息的举报人。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威胁要从那些不遵从有关宗教规定或禁令的家庭或村庄撤走政府补助。⁸³ 有些家庭或村庄因为参与了政治或宗教的抗议行动而被禁止采集冬虫夏草——这种每年只有几周可以采集的药草是很多藏人的一项可观的收入来源。⁸⁴

社会反响与抗争

中国对藏传佛教施加控制的多重手段，已经在西藏高原各地的僧俗民众当中造成明显不满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反感或引发骚乱的官方行为不 只是政府过度使用武力而已，还包括对平常生活的无处不在的管控，比如旅行禁令、禁止私下敬拜达赖喇嘛、在寺院里的政治宣传等等。⁸⁵ 这些管控措施对众多参与或未参与某种政治抗议的僧众都造成了影响。

这些干涉，加上官方惯常以施恩者自居的腔调，在藏人当中造成了强烈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政府不尊重和故意亵渎他们宗教信仰。日益增多的官方使用极端暴力的案例进一步说明中国官员和安全部队对藏人的生命缺乏尊重，2014年流亡海外的僧人和酷刑幸存者果洛久美（Golog Jigme，拉卜楞寺僧人）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即表达了这种感受，他说“政府觉得我们藏人还不如动物，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⁸⁶ 学术性的研究和藏人抗议者的记述都一再指出，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那些抗议行为，而不是流亡的运动人士或是达赖喇嘛的鼓动。然而，中国政府却一直声称藏人的抗议行为是受到“敌对势力”的影响以及“达赖集团”的煽动。⁸⁷

由于施加在那些公开挑战官方政策人士身上的严厉惩罚，以及通过政治化的司法体系寻求正义的前景渺茫，大多数藏人用四种方式来响应限制性的宗教政策——逃亡境外、⁸⁸ 合作、回避和“阳奉阴违”。

- **逃亡境外：**在2008年以前，每年有数千藏人逃亡。那些成功出逃的僧人和宗教领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他们的动机是想要接受良好的寺院教育，这在藏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⁸⁹ 随着西藏高原各地越来越多的警方检查站和尼泊尔边界的军力增强，逃亡这一选项已经基本被堵死，不过每年还是有很少一批难民出逃。
- **合作：**有很大一批藏传佛教领袖与中国当局积极合作，还有一些人寻求与地方官员进行洽商，从而在与他们对信众的责任和服从官方指令之间求得平衡，以图将官方的镇压行动降到最低程度。⁹⁰ 积极合作的最突出的事例是现年26岁由政府认定的班禅喇嘛确吉杰布。他在各种政府主办的会议上发言，还在一些特殊场合对信众进行教导，并在2010年年仅二十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官方媒体和统战部网站上刊登的文章中，经常特意发表其他一些僧人、住持和官方认可的活佛们的照片和言论，指出他们执行党的路线并感谢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⁹¹ 很多藏人对这些人持怀疑态度，而其他一些在当地社群德高望重

的宗教领袖则试图与地方官员建立起一种合作性的关系，以此来缓解冲突和抵御迫害，这些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⁹²

- **回避**：当政府在他们的寺院里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时，回避策略在僧侣们当中尤为普遍。根据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一座寺院的流亡僧人说，2012年官员们来寺院举办一系列学习班，尽管一再被要求参加，很多僧人还是不出席。他表示，由于官员们担心在寺院里引起抗议，宁可不强迫僧人们参加——这座寺院因曾经发生抗争而闻名，而类似的骚乱对官员们自己也会产生不良影响。⁹³

被迫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学习班的那些僧人们，很多人尽量修饰他们的发言，只承认官方宣传中要求背诵的某些部分，诸如尊重官方的宗教政策等等，而避免发表更加敏感，像谴责达赖喇嘛之类的意见。⁹⁴ 在另一些情况下，据了解一些僧尼在“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或是其他官方检查期间——例如确认寺院里有无18岁以下的僧人或者是否所有人都有获得在寺院学习的官方许可——会暂时逃出他们的寺院，躲避在当地社区或是在周边的山里。⁹⁵

- **“阳奉阴违”**：藏民众当中私下的抗争行动几乎和他们力图破坏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样的广泛和多样。这些抗争出现在中国政府无法触及的私人和精神信仰范围。很多僧侣和一般信众秘密保有达赖喇嘛的画像或检查者无法当下察觉的其他代表这位精神领袖的物品。这些物品或是藏在盒子里、在照片框背后、存在电子设备里，或是在毯子下面。有些地方官员或是同情藏人、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地区仅仅禁止公开张贴画像。⁹⁶ 很多藏人还在家中私下教育他们的孩子有关达赖喇嘛的事迹或是其他他们或许无法透过一般管道接触的藏传佛教的教义原则。⁹⁷

201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藏人庆祝拉嘎节（Lhakar，藏语意为“白色星期三”）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虽说该运动主要聚焦于展示文化认同（例如说藏语、穿戴藏装），但由于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其因而有强烈的宗教意涵。⁹⁸ 相对于其他人，越来越多的藏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寺院进行供养，或是在家中和当地宗教场所悬挂经幡。⁹⁹ 类似地，在禁止展示某些宗教象征的背景下，一些藏人会悄悄地佩戴“和平护身符”，代表他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决心遵从“佛教十善德”和不对藏人同胞暴力相向。他们通过这种间接的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和致力于藏人团结的决心。¹⁰⁰

藏民众当中私下的抗争行动几乎和他们力图破坏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样的广泛和多样。

尽管冒着监禁、酷刑和死亡的危险，每年依然有许多藏人僧俗民众以积极的和政治性的抗议方式反对政府对宗教的打压政策。¹⁰¹ 这些抗议几乎都是非暴力的。类似2008年拉萨自发性的骚乱事件和2013年在那曲比如县发生的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但是相对而言，已经少有发生。

自焚：近年来在藏区发生的最为激烈、极端和有争议的抗议形式，是自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¹⁰² 尽管最初的一些案例主要涉及僧尼，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信众采取这一行动，到2016年中期，自焚者中的信众人数已经超过了僧侣。从地理位置上看，绝大多数有记录的自焚事件（大约95%）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中以四川省发生数量最多。这种差异或许反映了西藏自治区对抗议运动和信息更加严格的管控，以及在2010年之前相对自由的地区，对打压政策更加强烈的反应。

虽说各项不同的官方政策都似乎激发了自焚抗议的发生，至少有些带有宗教色彩的部分，从抗议者呼喊的口号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口号包括“愿达赖喇嘛长久驻世”、要求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或是要求释放最初由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等等。但是，一些对藏区问题有深

入了解观察者认为，自焚抗议事件的增加大体上可以解读为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绝望情绪的一个信号，尤其当逃亡境外变得愈加困难的时候。尽管如此，这种抗议方式——以及达赖喇嘛没有对其积极加以指责——明显地在佛教信徒和西藏学者们中间引起了争议，有些人把自焚者看作殉道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便是在极端情况下，自杀行为也不应该被宽恕或美化。¹⁰³

公开抗议：随着当局将对自焚事件的惩罚扩展到自焚者的朋友、家人和甚至整个村庄，采取这种抗议形式的人数似乎在减少，在2016年上半年仅发生了两起有记录的自焚事件。取而代之的，发生在集市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单人抗议事件变得引人注目。这样的示威活动通常只有一名僧尼或是信徒手持达赖喇嘛的照片或是代表西藏独立的图片，比如西藏国旗，走过街市。安全部队通常会立即扑向抗议者并拘押他们。违犯官方禁令的较大规模的集会也依然偶有报导。

得失胜负谁评说

虽然面对种种困难和愈加严厉的打压，上文所描述的各种抗争依然取得了某些成功。最为显著的是在中国境内藏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尽管他已经流亡印度超过50年，尽管中国政府想方设法对他进行妖魔化、否定他的宗教权威和强迫信徒们谴责他。

事实上，这种韧性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中国自己政府的言论和旨在镇压所有对达赖喇嘛虔信迹象的各种运动。例如，来自中央统战部的一位高官认为，除了各种其他理由，政府支持的新建西藏佛学院在“抵御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方面也是非常必要的。¹⁰⁴再者，如果僧俗信众没人参加为达赖喇嘛进行的祈祷活动，或是没人在公共场所展示达赖喇嘛的画像，青海省有关当局就不会在2015年颁布的规定中，特别加入具体条款来禁止类似活动和重申有关惩罚。¹⁰⁵

至于其他的抗争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对于个人示威者甚或是自焚者而言，只要能够进行抗议并有他人在警方采取行动前目睹其抗议行为，就意味着一种胜利。逃离警方拘押并流亡境外的僧人果洛久美解释说，他成功抵达印度就是一个胜利，但是他被迫离开不愿意离开的故土，则是一个损失。他的案件得到国际关注，他说他两次提早获释和最终没有被判入狱得益于国际社会为此施加的压力。¹⁰⁶

对于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与中国当局磋商的藏人宗教领袖们而言，哪怕是获得小小的让步或是得到某些宗教活动的许可也是胜利。不过，想要减少与政府当局之间分歧的努力并非总能如愿以偿。2014年在那曲比如县，安全部队在一座神山附近发生的冲突中，向民众开枪，事后寺院领袖支付了受伤民众的医疗费用，然而当局最后依然在这年年底关闭了这座寺院。最近，在喇荣佛学院，尽管人们认为学院的领导人们与地方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大规模的强拆行为在2016年从未停止。¹⁰⁷这些挫败从长远而言，将使得避免冲突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表明妥协与调和得不到任何回报。

未来展望

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权威长期以来明确而又复杂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的主要宗教中独一无二。这已经给中共的政策带来特别的挑战——官员们试图在某些程度上允许一些宗教活动，而同时要强力镇压任何被认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行为。一直以来各种限制性措施都在强调后者的优先地位，不断地侵蚀破坏日常和平的宗教活动，并在越来越多的僧俗信众当中激起怨恨。

达赖喇嘛在2011年就已经将所有手中所剩的政治权威移交给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把他看做一个政治威胁，而不纯粹是一个宗教人物。事实上，中共寄望在十四世达

中国境内藏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中国自己政府的言论和旨在镇压所有对达赖喇嘛虔信迹象的各种运动。

“如果习近平有时间好好梳理对藏政策，停止攻击达赖喇嘛，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问题能够因而得到解决。”

— 学者罗伯特·巴内特

赖喇嘛圆寂之后，集中力量控制他的转世。政府已经宣称，下一世达赖喇嘛将出生在西藏境内。

由于藏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以及不愿意真正接受政府支持的班禅喇嘛，政府的声明似乎注定造成更多冲突。反之，如果中共领导人能决定采取更为调和的措施并接受达赖喇嘛作为宗教人物的作用，他们或许会因为社会紧张程度的降低而收获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有关西藏问题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认为，“如果习近平有时间好好梳理对藏政策，停止攻击达赖喇嘛，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问题能够因而得到解决。”¹⁰⁸

注解

1. 《民怨沸腾导致藏区反抗》（Simmering Resentments Led to Tibetan Backlash），Jim Yardley，《纽约时报》，2008年3月18日，<http://www.nytimes.com/2008/03/18/world/asia/18china.html>；《张庆黎做客新华网：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新华网，2007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2/content_5792651.htm。
2. 本文作者在2016年8月进行的采访。
3. 基于藏区案件的分析列举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中，这些分析来自于人权团体的报告和新闻媒体报导。见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2016年11月30日浏览）<http://www.cecc.gov/resources/political-prisoner-database>。
4. 《冷酷无情：中国“维稳”运动中藏人遭遇拘禁和迫害》，人权观察，2016年5月22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6/05/22/relentless/detention-and-prosecution-tibetans-under-chinas-stability-maintenance>。
5. 对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境外藏人研究者的采访，2016年7月。
6. 《信仰佛教人数众多，全国佛教僧侣22万居五大教之首》，中国民族宗教网，2014年4月3日，<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14041545-1.htm>。
7. 《西藏僧尼享受更多福利》，巴丹尼玛和达琼在拉萨报导，《中国日报》，2014年1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01/17/content_17242870.htm；《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9月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dfwtbbs/Document/1447090/1447090_4.htm。
8.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9. 《一中多藏：迪庆是“有西藏特色”的发展模式？》，Ben Hillman，《亚洲民族》杂志（Asian Ethnicity）11, no. 2（June 1, 2010）：269-77。
10. 在四川的一个村子对尼玛拉姆（Nyima Lhamo）的采访，2016年8月。
11. 《一中多藏》，Hillman；对Julia Famularo的采访，2016年8月。
12. 例如，在2005年至2010年担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张庆黎，就被认为是一名强硬路线领导；国家媒体曾引用他严词诽谤达赖喇嘛的言论，他亲自督导强化了“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相反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1980年代担任自治区书记的伍精华则领导了一段宗教复兴和重建的阶段。当时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下，全国有一种政治自由化的氛围。
13. 《中国拉拢一个佛教派别在全球诋毁达赖喇嘛》（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the Dalai Lama），David Lague, Paul Mooney, and Benjamin Kang Lim, 路透社，<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7，http://savetibet.de/fileadmin/user_upload/content/berichte/2007ReligionReport.pdf。
14. 《达赖喇嘛说，中国人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在加深》（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issue is growing says the Dalai Lama），达赖喇嘛办公室，2012年1月3日<http://www.dalailama.com/news/post/783-chinese-understanding-of-tibetan-issue-is-growing-says-the-dalai-lama>。
15. 《当今汉族与藏传佛教：一个来自南京的案例》（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ibetan Buddhism: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Alison Denton Jones, Sage Publishing, June 1, 2014, <http://scp.sagepub.com/content/58/4/540.short>；《藏传佛教与汉族：更强大的现代中国给西藏传统添加新内涵》（Tibetan Buddhism and Han Chinese: Superscribing New Meaning on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Modern Greater China），Joshua Paul Esler, http://research-repository.uwa.edu.au/files/4389752/Esler_Joshua_2013.pdf。
16. 采访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学程主任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2016年7月。
17. 采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人员，2016年4月。
18. 采访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2016年8月；见索达杰堪布的新浪微博，在2016年11月10日，该微博有2,151,223名粉丝。<http://www.weibo.com/suodj>。
19. 形势自195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越发危急。藏人对中共的疑虑开始增加，在西藏东部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反叛。在拉萨的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的权威正在逐渐遭到侵蚀，这更增加了不满情绪。随着东部藏区战斗的加剧，藏人中的反中情绪也在增加，促使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产生广泛担忧。

20. 《雪域境外流亡记》，约翰·艾夫唐 (John Avedon)，(New York: Vintage, 2015), 72.
21. 《龙在雪域》茨仁夏加 (Tsering Shaky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罗伯特·巴内特 (Robert Barnett)，《限制与异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与对藏管制》(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 The Third Forum and the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Tibet)，《当代中国事务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1, no. 4 (February 1, 2013), 45-107.
23. 同上。
24.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宗教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7。
25. 人权观察，《中国禁区：媒体封锁西藏和其他“敏感”话题》，July 6, 2008, <https://www.hrw.org/report/2008/07/06/chinas-forbidden-zones/shutting-media-out-tibet-and-other-sensitive-stories>.
26. 约翰·鲍尔斯 (John Powers)，《党即是佛：中国如何界定和控制藏传佛教》(The Buddha Party: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s to Define and Control Tibetan Buddhism)，(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 《儿童在拉萨骚乱的火灾中被烧死》，中国日报，2008年3月2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3/24/content_6559963.htm.
28.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转折点上的西藏：春季的起义与中国新镇压》，2008年8月6日，https://www.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Tibet_at_a_Turning_Point.pdf.
29. 同上。
30. 《党即是佛》，约翰·鲍尔斯 (John Powers)。
31. 2016年8月对一名2014年抵达印度的西藏僧人的采访，他是一名酷刑幸存者；2016年8月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和语言学院教授约翰·鲍尔斯的采访。
32. 自2009年以来，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省份已经确认有144起自焚抗议：2011年12起，2012年86起，2013年27起，2014年11起，2015年7起，2016年截至3月发生一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焚抗议地图：2009-2016》，2016年3月2日，<https://www.savetibet.org/resources/fact-sheets/self-immolations-by-tibetans/map-tibetan-self-immolations-from-2009-2013/>.
33. 很多自焚者的言论和遗言也显示，抗议的主要听众对象是他们的藏人同胞，很多自焚者强调藏人要团结要通过减少藏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说藏语、给孩子们传授藏人的文化传统来抵制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约翰·鲍尔斯的采访。罗伯特·巴内特 (Robert Barnett)，《西藏的政治性自焚：原因与影响》(Political Self-Immolation in Tibet: Causes and Influences)，Revue d'Etudes Tibetaines 25 (2012), 41-64,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ret/pdf/ret_25_03.pdf.
34. 自焚事件最多的月份据报导是2012年11月。《藏人为何自焚？》，茨仁唯色 (Tsering Woesser)，《纽约时报书评》，2016年1月11日，<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6/01/11/why-are-tibetans-self-immolating/>.
35. 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3年度报告》，October 10, 2013,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3-annual-report>;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来自中国内部对西藏政策的新挑战》，2013年6月27日 <https://www.savetibet.org/new-challenges-to-tibet-policy-from-inside-china/>.
36. 《中国前任国家主席的助手令计划被捕》，查尔斯·克洛佛 (Charles Clover)，金融时报，2015年7月20日，<http://www.ft.com/cms/s/0/a1e33ca6-2f4f-11e5-8873-775ba7c2ea3d.html#axzz4HhwJYdrl>.
37. 对罗伯特·巴内特的采访，2016年7月。
38. 《西藏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全文)》，2015年4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15/c_11114974653.htm.
39. 《日印特殊伙伴关系与中国》，苏巴什·迦毗罗 (Subhash Kapila)，南亚分析，November 13, 2016,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china>.
40. 《西藏：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习近平说》，Claude Arpi，August 26, 2015, <http://claudearpi.blogspot.com/2015/08/tibet-cherish-unity-with-china-as-if-it.html>.
41. 《“荒诞而可怕”的新规则把矛头指向家人、村民和寺院，加快对自焚事件判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4年2月24日，<http://www.savetibet.org/absurd-and-terrifying-new-regulations-escalate-drive-to-criminalize-self-immolations-by-targeting-family-villagers-monasteries>.
42. 《煽动自焚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甘南日报》，2012年3月12日，<http://gn.gansudaily.com.cn/system/2012/12/03/013508017.shtml>.
43. 《当局向西藏比如县藏人运动施加进一步限制》，Tibet Post International，2014年7月13日，<http://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150-further-restriction-imposed-on-tibetans-movement-in-driru-tibet>.
44. 《中国在达赖喇嘛生日前夕禁止藏区群众集会》，Richard Finney 等，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10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blocks-06102015160216.html>.
45.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西藏观察，2016年4月，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tibets_intolerable_monasteries.pdf.
46. 《限制与异动》(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罗伯特·巴内特 (Robert Barnett)；《西藏的动荡与区域自治的局限》(Unrest in Tibet and the Limits of Regional Autonomy)，本·希尔曼 (Ben Hillman)。见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编辑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反抗》(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Tibet and Xinjia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39.

47. 部分英文翻译见《中共西藏书记在南希佩洛西访问拉萨时，谈在反达赖喇嘛的斗争中划“红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11月13日，<https://www.savetibet.org/tibet-party-boss-speaks-of-establishing-red-lines-in-the-anti-dalai-lama-struggle-as-nancy-pelosi-visits-lhasa/>；《共产党警告那些暗中追随达赖喇嘛的各级干部》，Edward Wong, 《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
48. 《为达赖喇嘛祈祷和点酥油灯是“非法的”：热贡地区的新规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4月14日，<https://www.savetibet.org/praying-and-lighting-butter-lamps-for-dalai-lama-illegal-new-regulations-in-rebkong>.
49. 2016年7月，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
50. “西藏佛学院首批学员毕业 被授予自设学衔”，中共中央统战部，2013年7月16日，<http://www.zyztzb.gov.cn/tzb2010/S1831/201307/741370.shtml>.
51. 2016年7月，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中国：佛教寺院面临强拆》，人权观察，2016年6月9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6/09/china-buddhist-monastery-faces-demolition>.
52. 《非暴力：青藏高原上的移动信标》(Non-violence as a shifting signifier on the Tibetan plateau)，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当代佛教》(Contemporary Buddhism) (2016), 1-19,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39947.2016.1189155>;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2007年8月2日，<http://www.sara.gov.cn/zcfg/bmgz/571.htm>.
53. Hillman, 《西藏的动荡》(Unrest in Tibet)。
54. 对Julia Famularo的采访，2016年8月。
55. Hillman, 《西藏的动荡》(Unrest in Tibet)；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2016年7月。
56. 对一名西藏僧人的采访，2016年8月。
57. 《广场上的宣传：在中国西部向维吾尔人和藏人传达政府有关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Antonio Terrone. 见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编辑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反抗》(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40-59。
58. 国家宗教事务局,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59.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抵抗运动中的作用》。
60. 很多这些管控措施都是基于2007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办法，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的《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一书中有记载和英文翻译，见第89页。
61. 在西藏自治区，这种管控要求一个新的官方委员会来管理日常运作和强化宣教运动。在自治区以外，原有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系统得以保留，只是加入了一名政府官员作为副主任，当然会有些例外。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据报导，当局下令在2014年6月之前所有寺院必须由干部或党指派的人员替代原来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管委会成员。
62. 美国国务院《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部分(含西藏、香港和澳门)，本文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30日，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dynamic_load_id=256099&year=2015#wrapper.
63. 《达赖喇嘛对信众们说，“谴责我吧”》，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Canada Tibet Committee, 1999年2月8日，http://www.tibet.ca/en/library/wtn/archive/old?y=1999&m=2&p=8_3.
64. 2016年8月对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的采访；《中国：监控西藏无止期》，人权观察，2016年1月18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1/18/china-no-end-tibet-surveillance-program>.
65.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66. 《中国对藏人和其他人的国际旅行限制》，人权观察，2015年7月13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7/13/one-passport-two-systems/chinas-restrictions-foreign-travel-tibetans-and-others>.
67. 《共产党警告那些暗中追随达赖喇嘛的各级干部》，Edward Wong, 《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立党之本》，张磊,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1月9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11/09/content_19075.htm.
68. 《西藏的动荡》，Ben Hillman。
69. 对John Powers的采访，2016年8月。
70. 《妇女骇人吊死震惊藏区，警察禁言所有质疑》，Simon Denyer, 《华盛顿邮报》，2016年8月2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young-womans-death-in-tibet-provokes-anger-and-a-brutal-crackdown/2016/08/25/239b628a-63bd-11e6-b4d8-33e931b5a26d_story.html.
71. 《冷酷无情》(Relentless)，人权观察。
72. 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州比如县的茨城坚赞(Tsultrim Gyaltzen)和宇杰(Yulgyal)在2013年10月，分别被判处13年和10年徒刑，罪名是“从事分裂活动和散布(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谣言破坏社会安定。”
73.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74. 《因达赖喇嘛照片被判入狱18年》，自由西藏，2014年4月1日，<https://freetibet.org/news-media/na/18-years-prison-dalai-lama-picture>.
75. 僧人南杰慈成(Namgyal Tseltrim) 2013年5月11日从拉萨的一所监狱被释放，此前他被关押了将近8个月，没有正式逮捕、控罪或判决。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到酷刑导致右手失去功能。根据当地的一位藏人透露，当局在南杰慈成寺院里

- 的住处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达赖喇嘛讲经说法的DVD。当局随后指控南杰慈成犯有“分裂国家”罪。见《无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2月26日，<https://www.savetibet.org/newsroom/torture-and-impunity-29-cases-of-tibetan-political-prisoners/#tortured>。
76. 《西藏宗教领袖旦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Patrick Boehler, 纽约时报, 2015年7月13日,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4/world/asia/tenzin-delek-rinpoche-tibetan-religious-leader-dies-in-chinese-custody.html?_r=0。
 77. 同上。
 78. 《照片披露藏人遭中方枪击惨状》，藏人行政中央, 2015年7月15日, <http://tibet.net/2015/07/grievous-photos-emerge-of-tibetans-injured-in-chinese-firing/>; 《无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比如县实施新的严厉“整治”措施：尼师遭到驱逐并威胁要拆毁寺院和玛尼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November 20, 2014, <https://www.savetibet.org/harsh-new-rectification-drive-in-driru-nuns-expelled-and-warning-of-destruction-of-monasteries-and-mani-walls/>。
 79. 另有一位观察者注意到，这个地区也是一个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地方，一些藏人僧侣的汉语比藏语更熟练——这或许是寺院与官方关系比较少摩擦的一个原因或是结果。见《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 Hillman。
 80.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1. 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者的采访，2016年4月;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82.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3.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了西藏自治区江达县当局，命令居民叫回他们家人中在其他省份的佛教中心学习的僧尼，那些被发现违反命令的家庭被威胁取消所有形式的政府补助。见《西藏一个县的僧尼在宗教镇压运动中被迫返乡》，Kunsang Tenzin, Karma Dorjee 和 Richard Finney报导，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10月24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return-10242014162330.html>。
 84. 例如，在2014年9月，直接针对比如县的抗议活动，比如县人民政府下达严厉指令控制居民。列举出的惩罚措施如下：“悬挂或私藏达赖画像的普通群众将强制接受为期6个月的法制教育，并剥夺收集冬虫夏草的权利两年。”《比如县实施新的严厉“整治”措施：尼师遭到驱逐并威胁要拆毁寺院和玛尼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85. 《广场上的宣传：在中国西部向维吾尔人和藏人传达政府有关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 Terrone。
 86.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7. 《广场上的宣传》，Terrone。
 88.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9.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90.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
 91. 《环球时报》报导：来自昌都一座寺院的Jizhong活佛说，“现在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最好的时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爱国爱教的传统，为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另见环球网，“Training course for new Living Buddhas held.”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6253.shtml>。
 92. 一些观察人士一直把喇荣五明佛学院作为发展与地方官员积极关系的例证，但是这个事例在2016年当局发动强拆学院住所时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见《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 Hillman。
 93.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
 94. 这种方法并非总能成功，因为官员们也采取了相应的变化并要求更加直接的斥责。见《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95. 同上。
 96. 采访茱莉娅·法莫拉罗 (Julia Famularo), 2016年8月。
 97. 采访尼玛拉姆。
 98. 与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藏研究者的电子邮件交流。亦见于《拉嘎星期三运动：西藏精神的庆典》，美国之音，2012年7月13日，<http://www.voaitibetanenglish.com/a/1404065.html>。
 99. Tsedo, “Lahakat,” American Himalayan Foundation (blog), March 9, 2012, <http://www.himalayan-foundation.org/blog/114374>。
 100. 《非暴力：西藏高原上的移动信标》，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10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抗议事件受到中国政府无关宗教的政策或行为引发，例如有关学校的教学语言或是损害当地环境的开发项目等等。由于本报告主旨为宗教，这些抗议因而没有被考虑在内。
 102. 有一起自焚抗议发生在2009年，但是由于在时间上属于独立事件而没有计算在内。
 103. 对罗伯特·巴内特和境外希望保持匿名的藏人学者的采访，2016年7月。
 104. 朱维群，时任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见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度报告》，2012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2-annual-report>。
 105. 《中国发布“有关西藏独立的20项违法行为”》，Oliver Arnoldi,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2015年2月25日,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436-china-issues-20-illegal-activities-related-to-the-independence-of-tibet>。
 106. 西藏观察，《果洛久美加措访谈》，2014年7月, 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an_interview_with_golog_jigme_gyatso.pdf。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